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3.021

#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尚荣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周敦颐不仅是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关键词:**周敦颐;诗文观;文以载道;主静无欲

**中图分类号:**B24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3-0179-06

周敦颐最为世人所熟知的作品是《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sup>①</sup>一句道尽了周敦颐所追求的高尚境界。相传其住所的窗前杂草丛生,周敦颐却从不锄去,人问之,他答:“与自家意思一般。”<sup>②</sup>这体现了他要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胸怀。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曾评价周敦颐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sup>③</sup>其中“光风霁月”一词可谓形容得恰如其分。周敦颐不仅在文章方面成就很高,而且在诗歌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以诗言理,这常常被学者们所忽视。作者试图分析周敦颐的诗文观,在此基础上论述其诗歌中的哲理意蕴,阐明周敦颐对后世的开创性影响,以期展现他在文学,特别是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之全貌,为学者们研究北宋文学和哲学提供参考。

## 一 “诗可以兴”与“文以载道”

周敦颐虽然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

位,但他传世的著作并不甚多。宋中期时就已经是“所著之书,又多散失”<sup>④</sup>的情况。在这些有限的文献中,关于诗文的论述更是凤毛麟角,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今日完全无法探求周敦颐的诗文观。从其他学者对周敦颐的回忆与记载中,以及周敦颐本人的哲学理论表达中,依然可以对其诗文观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在诗歌方面,虽然周敦颐并未有直接的诗论,但程颢曾言:“诗可以兴。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sup>⑤</sup>度正在《周敦颐年谱》中也提到周敦颐年轻之时“志趣高远。里有濂溪,溪有桥,桥有小亭,先生常钓游其上,吟风弄月,至今父老犹能言之”<sup>⑥</sup>。从这些侧面描述中可以看出,周敦颐是喜好并推崇诗歌的,其行为举止有诗的气度,能感染身边之人。从这一角度而言,“诗可以兴”是可以反映周敦颐的诗歌观的。何谓“诗可以兴”?《论语》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收稿日期:2022-10-19

作者简介:尚荣(1978—),男,江苏东台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①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页。

②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页。

③黄庭坚:《黄庭坚诗集注·山谷别集诗注卷上》,任渊等注,刘尚荣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411页。

④朱熹:《通书后记》,载《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9页。

⑤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9页。

⑥度正:《周敦颐年谱》,载《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0—101页。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是孔子对诗歌作用的论述,将诗歌“兴”——感发志意之用排在第一位。那么,这种“志意”的取向为何?大多数儒者的主张是分辨善恶,周敦颐也不例外,他说:“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sup>①</sup>朱子对这一点的阐发更为详尽:“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sup>②</sup>

周敦颐所表现出“志意”的另一个维度,是程颢所体会的“吾与点也”。“吾与点也”即“曾点气象”,亦出自《论语》。当孔子令学生各言志向之时,曾点的回答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孔子赞许道:“吾与点也!”可以看到,曾点所描绘的,是一种看似普通的日常,但其中富含吾性自足、完满喜悦的境界,而这正是周敦颐所极力追求的。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构建了“无极而太极”的世界构架,人在其中的标准定位是“中正仁义”<sup>③</sup>,故完满无缺。也正因此,周敦颐对“孔颜乐处”非常推崇,他说:

颜子“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sup>④</sup>

颜子之乐,不在于贫贱,而在于境界。故无论处于富贵贫贱何种环境,皆能专注于道德境界而自得其乐。周敦颐的“吟风弄月”之潇洒喜悦,归结点也正在于此。“诗可以兴”是外在的自然之

美引发主体内在的道德之乐,诗歌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更类似于一种导引。所以,诗也一定要由心而发,才有意义,否则只是为了作诗而作诗,就丧失了道德引发的关键功能了。周敦颐在《与傅秀才书》中言:“每会即作诗,雅则雅矣,形亦劳瘁。”<sup>⑤</sup>这就是说如果每次集会都要作诗的话,虽然看起来很风雅,但是强求为之也会让人感到疲惫,丧失了“兴”的作用。

周敦颐的诗文观在文章方面可以表达为“文以载道”。周敦颐在其著作《周子通书·文辞第二十八》中言:

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sup>⑥</sup>

关于文道关系,在周敦颐之前,有许多思想家都提及过,如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原道第一》中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sup>⑦</sup>,韩愈在《争臣论》中又说“思修其辞以明其道”<sup>⑧</sup>。虽然这些观点都表达了“文以载道”的意思,但是“文以载道”这个概念是周敦颐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周敦颐继承了韩愈“本志乎古道者也”<sup>⑨</sup>的古文运动精神,认为“道”是核心,是实有存在的,“文”只是一种装饰技巧,是为传“道”而存在的。如果一篇文章只有华丽的文辞堆砌而没有充实深刻的内容便是空有其表。周敦颐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sup>⑩</sup>他认为“文”是服务于“道”的,“道”是内容,“文”是形式,二者相辅相成,

①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

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5页。

③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页。

④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2—33页。

⑤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页。

⑥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36页。

⑦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页。

⑧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⑨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40页。

⑩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页。

离开内容而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和发达是不可取的,这其实也表达了一种“文道合一”的思想。周敦颐“将儒家的‘道’极大地突出出来,强烈地表现出了新儒家(道学)的基本立场和要求,他的‘文以载道’说典型地表现了儒家的文道论”<sup>①</sup>。

综上所述,周敦颐的诗文观与孔子、孟子以及韩愈等人是一脉相承的,是儒家非常正统的诗文观。这与《宋史》中《道学传》对周敦颐的评价是一致的:“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瞭若指掌。”<sup>②</sup>这虽然主要是对周敦颐哲学思想的评价,但周敦颐的诗文观,也正是在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下文将以周敦颐的诗文创作为例,进一步探讨其诗文观的主体实践。

## 二 “孔颜乐处”与“主静无欲”

周敦颐所创作的诗文传世很少,就文章而言,《周敦颐集》中仅收录五篇,其中文学色彩较强的只有《养心亭说》与《爱莲说》两篇。周敦颐的诗歌也同样散佚严重,因此自南宋以降,历代学者都对此进行过辑佚。《周濂溪集》繁多且复杂的版本,导致了周敦颐诗歌辑佚工作困难重重。《全宋诗》“以清康熙张伯行刊《正谊堂集·周濂溪集》为底本,校以清乾隆董榕辑《周濂溪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周元公集》等。辑录之集外诗附于卷末”<sup>③</sup>,一共收录周敦颐诗三十三首。虽然当代学界对《全宋诗》中所收录的三十三首周敦颐诗歌也提出过疑问,但由于他们的辑佚也是疑点重重,难经仔细推敲,所以文章认为还是应以《全宋诗》为标准。从周敦颐的这些诗文创作中,

可以看出其中含有丰富的哲理意蕴,这是其诗文观的实践反映。

周敦颐在诗歌创作中发挥了“诗可以兴”的作用,重视抒发主体情感。在他的送别诗、咏物诗中,无不有“我”在,并且往往归结于“我”主体的内在道德之上。周敦颐之文章,也同样紧扣其“文以载道”的诗文观。其传世的五篇文章中,皆基于儒者本位,以阐释儒家思想为核心。周敦颐在诗文中所展现的主要哲学意蕴,是儒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即“孔颜乐处”与“主静无欲”。

如上文所言,“孔颜乐处”出自《论语》,它指的是孔子和颜回已经达到了一种超乎富贵的人生境界,他们完全不在乎外在环境的恶劣而能自得其乐。“这种乐是他们的精神境界带给他们的,不是由于某种感性对象引起的感性愉悦,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享受,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内在幸福和愉快。”<sup>④</sup>周敦颐在诗作之中,屡屡展现这种精神境界之乐,他在《任所寄乡关故旧》一诗中写道:

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  
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筋常餐淡菜盘。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sup>⑤</sup>

此诗中的周敦颐,虽然物质上贫寒,但是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正是其道德境界的表现。其《牧童》一诗,更是直接地表现了这种快乐:“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sup>⑥</sup>牧童是否真的“乐”我们并不知晓,但周敦颐毫无疑问是从这样的闲适观照中得到了心灵之乐。除自然景色之外,周敦颐也会从儒家经典中得到很多乐趣。其《暮春即事》云:“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sup>⑦</sup>《读易象》云:“书房兀坐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千年远事,

①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页。

②中华书局编辑部:《二十四史·宋史卷》,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937页。

③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卷四一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1页。

④陈来:《宋明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2—53页。

⑤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页。

⑥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页。

⑦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页。

而今只在眼前头。”<sup>①</sup>诗中虽然没有明写“乐”，但这种温润平和的安乐意味，已经被描写得十分明显了。周敦颐所要追求的“道”并不是“乐”的对象，而是人们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所自然而然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乐”来自“见其大”即“见道”或者“体道”。周敦颐提出的寻“孔颜乐处”问题对于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寻“孔颜乐处”为古代儒学增添了人格美和精神境界的内容，因此它成为了古代儒家与宋明新儒家的重要区分标志之一。

周敦颐诗歌中蕴含的深刻哲理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主静无欲”的哲学修养论中。在《爱莲说》中，周敦颐推崇“可远观而不可亵玩”<sup>②</sup>的莲花，体现的正是君子之乐静。周敦颐的诗歌也很好地体现了其“主静”思想，如《静思篇》：

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  
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  
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  
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sup>③</sup>

周敦颐在该诗中描绘了自己归隐山林之后的生活，通过“日”“山”“榻”“云”“窗”“瀑”等意象以及与朝堂之上做官的忙碌作比较，表达了其对清闲宁静的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同时蕴含了其“主静”思想。

那怎样做到“静”呢？周敦颐认为“无欲故静”，“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sup>④</sup>。“无欲”并不是说要禁止人的一切感性欲望，而是指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杂欲，它是人们在特定修养过程中达到意识静虚状态的必要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心”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周敦颐提出要“养心”，人们可以通过去除“名利心”来上达“天心”，正如其诗歌《同友人游罗岩》中云：

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

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sup>⑤</sup>

此外，还有《题门扉》一诗：

有风还自掩，无事昼常关。  
开阖从方便，乾坤在此间。<sup>⑥</sup>

该诗前两句以“门扉”写“心扉”，告诫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沉静自守，后两句指出“道”就存在于心门的一开一合之中，别有一番佛教禅意诗韵味，整首诗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周敦颐“主静无欲”的哲学思想以及在恬静自然中与乾坤合二为一的崇高境界。

“主静无欲”与“孔颜乐处”并非截然二分，因为周敦颐提倡“主静无欲”就是为了寻“孔颜乐处”。《四库全书总目》说：“周子之学，以主静为宗。”<sup>⑦</sup>这有一定的道理，周敦颐的“主静”说来源于道家哲学中的“主静”，二者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本质区别。周敦颐的“主静”说与道家哲学中的“主静”都要求静心沉思，排除杂念，但周敦颐的“主静”说作为人们修身之法，它的目的是“求道”，进而达到“内圣外王”的入世境界，从而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目标，而道家哲学中的“主静”则是主张绝对的“静”，它追求的是与宇宙本原一致的主体之精神自由，即人们常说的“逍遥游”，其目的在于出世，所以归根结底，二者还是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区别。

### 三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

程颢与程颐在青年时期就学于周敦颐，因此，周敦颐的诗文观对“二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影响各不相同，究其原因，可能是二者的性情不同，亦或是遗传基因的差异。程颢认同周敦颐的诗文观，因此他的诗中多言“性”与“理”等哲学理念，此外，程颢与周敦颐的诗作在题材、主题与写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程颐却比较排斥周敦颐的诗文观，他主张“道为文心”，片面

①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5页。

②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页。

③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4页。

④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页。

⑤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8页。

⑥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1页。

⑦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周元公集》，载《周敦颐集·附录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8页。

发展“道”的一面,甚至认为“作文害道”,潜心于写作是“玩物丧志”,文辞优美的作品如同俳優,但是程颐并不是全面反对诗歌,他只是反对不含理趣的诗歌,反对不追寻“理”而追寻文辞的行为。《二程集》中收录程颢诗作六十七首,其中不乏《春日偶成》这样的佳作,程颢的诗作从宋代至今都广受好评,而程颐存世诗歌较少,《二程集》中仅录有三首。“二程”的弟子不少,其中杨时、游酢、尹焞等人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诗文观,他们对天理性命进行宏大叙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

由于周敦颐、“二程”及其门人的诗歌影响较大,所以王利民“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这一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定义为‘濂洛风雅’”<sup>①</sup>,因为周敦颐开创的学派被后人称为“濂学”,“二程”开创的学派称为“洛学”。具体来说,王利民认为周敦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人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观点,是因为王利民觉得周敦颐开创的濂学有学派之名,而无学派之实,“二程”才算是真正的开宗立派。从以上可以看出,王利民将“濂洛风雅”一词的范围限定在濂洛一脉,文章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二程”及其门人之后,随着时局、地域、士风和学风的变化,社会上延伸出了关学、闽学、湖湘学、浙学等新诗风,如张载、邵雍、朱熹、王阳明等人,“濂洛风雅”已不足以概括当时百家争鸣般的精彩局面。“‘濂洛风雅’发源自理学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映衬了古典诗歌情境化审美向近世诗歌义理化审美的转型,它展示了理学家的诗意生存状态,并以审美的方式参与了新儒学的重铸。”<sup>②</sup>

南宋理学家金履祥曾编撰理学家诗总集,命名为《濂洛风雅》,该总集共六卷,自周敦颐起,终于王伋,一共有四十八人,该书最前页仿照吕本中《江西诗派图》作了“濂洛诗派图”,以师友渊源为

谱系,并附有濂洛诗人简单的生平仕历。清代张伯行选取周敦颐至罗洪先等十七人之诗凡九卷,亦命名为《濂洛风雅》,该书从选目到编排都与金履祥所编书不同。虽然存在差异,但是从金履祥与张伯行所选人物来看,他们认为的“濂洛风雅”之范围就宽泛很多,濂洛关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基本都包含在内,周敦颐还是初澜,主潮则变成了朱熹等人。

由于金履祥编撰的《濂洛风雅》是古代第一本理学家诗总集,所以一般认为“理学诗”诞生于此。所谓“理学诗”,从广义上来说,就是指以理论入诗,如魏晋玄学诗、两宋理学诗和佛教禅意诗等,但是并不是所有蕴含理论的诗歌都可称为“理学诗”,“理学诗”中所阐发的理论是形而上的,它与主流诗歌存在一定的隔阂,其哲学性胜于文学性。从狭义上来说,“理学诗”就是指两宋理学诗,它是与“理学”(新儒学)诸学派同时出现的一种诗体,理学家在运用诗歌来纪事、咏史、记游、酬唱的同时抒写理学境界,表达理学感悟,阐述理学思想<sup>③</sup>。王传林认为,“‘理学诗’的生发是在汉唐‘抒情’与‘言志’诗风上的一种诗歌创作范式的创新,它是因循先秦儒学在唐宋之际的新变之路向与北宋时代精神之向度而产生的”<sup>④</sup>。文章十分认可这种观点。由于宋明理学也被人们称为宋明道学,所以清儒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濂洛风雅》提要中也称两宋理学家所作诗歌为“道学之诗”。

周敦颐作为“濂洛风雅”之初澜,无论在以理论入诗的诗歌内容还是在古朴坦易的诗作风格上,都是宋代理学诗派的开风气者,后世理学家作诗或多或少都受到其影响。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中崭露头角,为宋代诗坛带来了一缕别样的新风。

## 结语

吟诗作赋是古代文人交际的重要形式,理学

①王利民:《濂洛风雅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②王利民:《濂洛风雅论》,《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

③张海沙,曹阳:《论诗学审美范畴“机趣”——兼论机趣与理趣之区别》,《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④王传林:《北宋“道学之诗”中的“趣”与“理”》,《中国诗歌研究》2018年第2期。

家们也不能免俗,作为宋明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就是其中一位,他继承并发扬了儒家“诗可以兴”与“文以载道”的诗文观,并将此观点运用到诗歌写作中,形成了世人熟知的濂溪范式。自宋至清,世人围绕周敦颐写作了不少的诗歌,如缅怀周敦颐的祭祀诗、对周敦颐的怀念诗、在相关地方的交游诗以及阐发周敦颐思想的哲理诗等等,这些诗歌被统称为“濂溪诗”。苏轼也曾作过“濂溪

诗”,他对周敦颐非常推崇,只因他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品格与周敦颐十分契合,苏轼曾说“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sup>①</sup>,并赞之以“全德”。周敦颐的诗歌中蕴含着深刻哲理,这开启了宋代诗歌与哲学发展的先河,他创作的诗歌写作范式和哲学论纲式的表达为后人利用或引申留下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 Zhou Dunyi's Views of Poetry and Prose and Its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SHANG Ro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Zhou Dunyi was not only the originator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but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poetic creation paradigm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He highly praised poetry and thought that “poetry can be revived”, which could express “Zengdian Qixiang”,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aoism. Zhou Dunyi's poems were deeply influenced by Neo-Confucianism. His poems revealed his pursuit of “pleasure of Confucius and Yan”, which contained the profound philosophy of “maintaining tranquility without desire”. Zhou Dunyi's poems were called the beginning of “Lianluo Fengya” by later generations. It was also from Zhou Dunyi that “Neo-Confucian poetry” gradually emerged in the poetry circle of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Zhou Dunyi; the views of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s are for conveying truth; maintaining tranquility without desire

(责任校对 王小飞)

<sup>①</sup>苏轼:《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载《苏轼诗集》,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667页。